

蓝博洲：

历史记忆、青年叙事与祖国认同

□陈美霞

在声色犬马的消费社会中,在荒烟蔓草的历史尘埃里,蓝博洲孜孜不倦地寻找、勾勒台湾这片土地的红色记忆。可喜的是,蓝博洲的《幌马车之歌》修订版和《幌马车之歌续曲》《寻找祖国三千里》相继在祖国大陆出版。这一批文本的共同关注点是上世纪50年代白色恐怖中牺牲受难的台共党人、左翼志士。他们的个人生命与国家民族的解放事业相联系,波澜壮阔、深情无私。

历史记忆的遮蔽与敞开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统战问题、“新国族机器打造”等层出不穷。不同意识形态力量为了争夺政治权力操弄族群矛盾、湮灭历史记忆。通过田野踏查、口述访谈、文献摘录等方式,蓝博洲挖掘整理被主流意识形态与消费社会漠视的四五十年代台共党人追寻祖国统一与人民解放的光辉历史。这一批“民众史”调查报告再现了被暴力与谎言湮灭的历史,对台湾主流社会歪曲“二二八”、漠视上世纪50年代白色恐怖肃清历史的行径予以正本清源。

蓝博洲以冷静平缓的叙述呈现了四五十年代革命志士求索中国现代性出路、追寻红色祖国的青春风雷与理想挫折,批判了国民党的反共亲美与犬儒时代的政治冷漠。他揭开白色恐怖对整整一个时代革命青年的毁灭、刑杀,重建战后台湾红色历史记忆。《幌马车之歌》是蓝博洲影响最为广泛的作品,侯孝贤的电影《悲情城市》《好男好女》部分内容即取材于此。该书围绕主角钟浩东在日据、光复与国民党迁台初期的事迹,展开台湾青年的理想追寻之旅。钟浩东是台湾抗日运动领袖蒋渭水的女婿,因为民族情感组织医疗队,携妻子奔赴大陆参加抗日,抗战末期对国民党的阶级属性渐渐有了了解,思想开始左倾。台湾光复后,钟浩东投身教育,“二二八”事件中,钟浩东担任校长的基隆中学学生尽力保护外省老师。随后,钟浩东亲自主持时事讨论会,通过学习战后中国时局发展与国共阶级立场,纾解台湾青少年的认同危机。钟浩东及其同仁还印发《光明报》传播革命理念,事发被捕,史称“基隆中学案”。国民党基于本省人不了解大陆情况,为了争取人心,对本省籍不少涉案者“判感训”,钟浩东不愿意接受国民党的感化训练,坦然赴死。《幌马车之歌续曲》讲述了“基隆中学案”被捕牺牲的李苍降、蓝明谷、邱连球的故事。其中,李苍降是李友邦将军的侄子,也是钟浩东的入党介绍人。毋庸置疑,蓝博洲的非虚构写作,延续了陈映真的《山路》《铃铛花》《赵南栋》《当红星在七古林山区沉落》中关于白色恐怖历史创伤的救赎书写与话语重构。

对待创伤事件,陈映真认为应该“获取历史的智慧,根本解决此一历史问题,进一步疗伤止痛,建设民族内部的和平、团结与发展”。蓝博洲对红色历史记忆的挖掘,与其在陈映真创办的《人间》杂志的工作经验密不可分。蓝博洲首篇“民众史”调查报告《美好的世纪》就是发表于《人间》杂志,主人公郭琇琮是具有浓厚民族意识与祖国情怀的台湾本省优秀医师。日据时期,郭琇琮因不遗余力反抗殖民统治而入狱,光复后积极参与社会运动,“二二八”事件后思想左倾,加入地下党,50年代政治肃清时,仆倒马场町刑场。郭琇琮是吴思汉的入党介绍人,吴思汉是《寻找祖国三千里》的主人公,蓝博洲纵横结合,铺排吴思汉从日据、光复到国民党迁台的故事。吴思汉原名调和,人称“调和仔”,改名“思汉”即思慕汉族。吴思汉为了参加祖国的抗日事业,离开台湾赴日本留学,千辛万苦辗转朝鲜、“伪满洲国”、北京、秦皇岛、河南、西安、成都,赶赴抗战后方重庆;一路换乘渡船、火车、汽车,遭遇各种怀疑、驱逐,甚至被误以为是日本间谍而入狱。来到重庆后,吴思汉依然遭到国民党的怀疑与陷害。吴思汉的事迹带动了在重庆的李万居、宋斐如、李纯青、谢南光等台湾前辈,他们邀请他小聚,并把情况告诉他。吴思汉觉得“为抗日而来,为什么不可以为抗日而去”,欣然接受跳伞回台湾接应盟军登陆台湾的任务,后因盟军登陆冲绳而取消。为此,李万居、李纯青等纷纷著文探讨归来祖国的台湾青年的安置问题。光复回台后,吴思汉先在《台湾新生报》工作、后开书店介绍进步书籍,并积极组织群众,活跃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劳工阵线。50年代政治肃清中,吴思汉倒于国民党枪口之下。

蓝博洲笔下的钟浩东、吴思汉、李苍降、蓝明谷、林如堦等一大批优秀台湾青年有着相似的思想与经历,一心向往祖国,抗日战争时期奔赴大陆参与全民族的解放运动,光复后他们为何加入共产党地下组织走上了反抗国民党的道路?国民党政权对台湾的腐败接收以及“二二八”事件的过度镇压,使得民众对“白色中国”失望,为了寻求出路,台湾进步青年纷纷左倾,转向“红色中国”,参与中国人民探寻祖国现代化的路线选择与前途探寻。

革命理想与青年叙事

蓝博洲的文字平静节制,采访人口述、他者日记、案件档案与叙事者声音交叠呈现历史事件与人物性格。有趣的是,

蓝博洲呈现了分断时代台湾青年不分省籍族群,为了民族国家的前途,勇于牺牲自我的奋斗历程,重建“民众视野”与“中华民族认同”的台湾叙事。由此,蓝博洲的非虚构写作并不仅仅是个体性的,而是传承了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台湾左翼志士的革命精神,继承了陈映真等知识者的话语实践。



社会追求物质满足的青年大相径庭,他们自动放弃优渥生活,投身艰险的革命事业。吴思汉被捕后,为了营救年仅27岁的儿子,其父四处上书陈情并百思不得其解,自身家庭条件不错,无须为生计担忧,儿子为何走上这条路?吴思汉简单朴实,没有读书人的架子,虽在阶级区隔的年代,却欣然吃路边摊,甚至讽刺女朋友“你以为你比较高尚是不是”。吴思汉们关心的并非个人享受,他们的视野是整个国家民族的解放。在狱中吴思汉总是把家里送来的东西平分给狱友们。等待死刑执行期间,吴思汉每天穿好西装,整理好头发;点过名,不是自己,就把西装脱掉,随手一丢,说:“还未轮到,夭寿。”吴思汉无私的精神品质与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亦是消费社会成长起来的青年所缺乏的。

钟浩东、吴思汉、李苍降、邱连球、蓝明谷、林如堦、邱连球、李中志等台湾革命青年的生命,因为参与民族解放事业而鲜活亮丽。这些左翼青年的生命史,超越个人经验,成为富有时代意义与公共意义的青春缩影。革命青年坚贞不屈的人生道路既是台湾历史的断片,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缩影,更侧面反映了近现代以来中国青年探索民族解放与国家独立的艰难曲折。

重建民众视野的祖国认同

在“本土正确”政治热潮中,“台湾主体性”几乎等同于福佬族群的主体性。针对台湾分离主义思潮,蓝博洲借着不分省籍族群的历史叙事,无形中批判了福佬中心主义操弄下的族群撕裂与认同异化。

作为一种介入式文学实践,蓝博洲的非虚构写作不乏立场与态度,叙事者声音有时候自然而然嵌入文本结构之中,有时候以受访人的口述、他人回忆录的摘编而呈现。他的视界并非限于50年代政治肃清“朗澈地赴死”的横截面,而是纵向追溯左翼志士既短暂又辉煌的整个生命历程。蓝博洲的笔触从日据时代开始,通过田野踏查与对亲近者的访谈,呈现左翼志士的幼儿时光、少年时代与青年岁月,由此可知祖国不仅是台湾民众抵抗日本殖民的精神资源,不少台湾青年甚至亲赴大陆参加社会建设与抵御外辱。日据末期,吴思汉担心自己大学毕业前就会以充当“日本军医”的名义被强征到前线,不仅无法实现归国夙愿,或许还会与祖国军队枪口相向。吴思汉与朋友商谈对策,“大家一致同意:最好的出路就是前去大陆,参加祖国的抗战组织,成为祖国军队的一兵一卒,尤其是加入空军,参加对日空战的行列”。吴思汉偷偷逃出台湾,绕道东京,假冒日本人,穿越朝鲜半岛,在鸭绿江边呼喊:“祖国啊,请你看我一眼,你的台湾儿子回来了!”

蓝博洲关于“二二八”与“白色恐怖”的非虚构写作,张扬台湾青年不分省籍族群为了追求国家民族的解放,不惜牺牲自我的精神。钟浩东是客家子弟,日据时期不甘殖民歧视,加上阅读《三民主义》及五四文学的作用,钟浩东生发了僑慕祖国的情懷,高中毕业后获得父亲许可游历大陆,“餓了他‘看看中国’的心愿”;他的民族意识与祖国情怀也感染了弟弟钟理和及周围朋友。钟浩东一行五人赴重庆抗日途中,为了表示决心,把日本护照都丢到大海里。他们绕道上海、香港进入广东,身份检查时候,被国民党干部认定是日本派来的间谍、汉奸,差点遭枪毙,幸遇丘念台搭救。在去大后方重庆还是坚守抗战前线之间,他们选择后者,两位新手妈妈哭了三天两夜,忍痛把头生子送入。他们的祖国认同之旅虽然艰险不断,但始终不改其志,始终关心祖国的前途命运。蓝博洲的非虚构写作再现了20世纪上半叶台湾民众反抗日本统治、参与祖国重建的历史往事,对现今台湾部分人美化日本统治的“殖民现代性”思潮是一种纠正,对台独派“去中国化”的反共亲美日意识形态是一种回击。

钟浩东、吴思汉、蒋碧玉、萧道应等台湾青年关山万里赴大陆参与抗日事业,从而展开了内在于中国革命进程的台湾青年的理想追寻。蓝博洲呈现了分断时代台湾青年不分省籍族群,为了民族国家的前途,勇于牺牲自我的奋斗历程,重建“民众视野”与“中华民族认同”的台湾叙事。由此,蓝博洲的非虚构写作并不仅仅是个体性的,而是传承了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台湾左翼志士的革命精神,继承了陈映真等“左统派”知识者的话语实践。

冒着被视为“做广告”的猜疑,我在这里真情呼唤:请关注“澳门文学奖”!

两年一度的“澳门文学奖”,自1993年开始至2015年已举办11届,前后历时20多年。现在,第12届正在进行中。尽管时间不算长,规模也不算大,却堪称一桩澳门文化盛事。现在,这一奖项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瞩目,其意义和作用正在日益彰显出来。

一是营造了一种高雅的文化氛围。1990年代之初,当“上帝休息”,理性缺席,社会上欲望的潘多拉魔盒已经打开,商品及其诱发的物质享乐成为消费时代真正主宰的时候,以推动澳门文学创作,树立“澳门文学形象”为宗旨的澳门文学奖满怀信心地“登场”了。它所崇尚的人性关注、理想精神和美学价值,通过文学书写而形成那种温馨的人文气氛和情调,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至少是一部分人源自生命内在需要的审美冲动,并让小城原有的绵绵诗意得以更好地延续。自然,最初的影响或许是轻微的,但长远的意义却是显见的。它表明,在这消费时代,拥有纯真善良、眷顾宇宙人生的澳门人,并非如博德里亚所说,只是“盲从不假思索的参与”,相反,他们心头因热烈的精神追求和诗意渴望而弥漫着“批判的内在动力”,这是澳门文化生态的优质元素。

二是推动了澳门文学队伍的建设。作为一个奖项,澳门文学奖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鼓励方式。在这种鼓励下,中老作家百尺竿头,层楼更上;年青新秀孜孜以求,茁壮成长,像郑卓立、李宇樑、廖子馨、邓晓炯、卢杰桦、吕志鹏、郑国伟、黄春年、袁绍珊……这些活跃于澳门文坛的“中坚”人物,或因得奖而闻名,或因失奖而发愤,澳门文学奖成为他们文学生涯的助推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澳门文学奖还激发并强化了更多人的文学信心,从而使澳门文学队伍不断成长和发展。毋庸讳言,整个社会为物质消费所带领的现实,已相当严重地影响到人们对文学事业的信心。而文学信心的缺失,势必导致文学艺术对商业化要求和消费化标准的屈从,让许多作家“变调”、“失语”,甚至黯然“离场”。一些地方出现的“文学死了”、“小说死了”之类的看法,便反映了这种情况。而澳门文学奖以其对文学基本原则和标准的坚持,给了澳门作家一种面对逆境的自信和勇气,成为澳门文学保持自己的思想独立性,不断展示独特而具一定深度的思考的一个动因。

三是加强了文学经验的交流。这种交流,一在参赛者及更多的文学爱好者之间,一在赛事评委之间及参赛者之间。这里着重谈一谈后者。澳门文学奖的评审工作,历来由内地、香港、台湾和澳门学者、作家担任。这样做,不仅可以确保赛事的公平、公正,而且十分有利于交流经验,取长补短,扩大视野,提高水平。内地评委的理论意识,香港评委的主体意识,台湾评委的现代意识,澳门评委的本土意识,在评审的过程相互碰撞、吸收、融合,达成共识,以统一的标准观照所有的参赛作品,大大减少了主观臆断而增强了科学性。如果说,评审的过程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那么,受益者并不限于几位评委,作为对澳门文学发展的一种引领,评审结果给每一位参赛者都带来启示。

四是参与了澳门文学佳作的筛选。澳门文学奖始终坚持寻找和阐释澳门鲜活的文学,从中发掘固有的文学经验和新的文学经验,这是我们对澳门文学的一种态度。文学批评的要务之一即是筛选经典,以为文学史的基础。澳门文学虽然尚未产生经典作品,却也不乏足以让澳门人“敝帚自珍”的佳作。澳门文学奖作为一种批评的存在,其价值和意义便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于本地佳作的寻求、发现和弘扬,不然批评的力量和进一步的可能性将被弱化乃至消解。澳门文学奖通过批评筛选出一批批为人啧啧称道的优秀作品,建构起佳作系列,维护了文学价值,在现代传媒大发展、大扩张的当下,踏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并为澳门文学史的书写做了一份基础工作,实在是值得大家关注的。

“澳门文学奖”的实绩,显示着它走向世界的必然性。从第12届起,奖项特别增设“公开组”,分散文和短篇小说两类,向海外华文作家和文学爱好者征文。由此,我们心头又升起更加热烈的期待: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澳门文学奖”,而澳门文学也一定会走向越来越广远的时空。

